



权利人执法部门平台合力打假

大型电商平台销售假货投诉减少

诚信建设万里行

编者按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假冒伪劣商品从线下转至线上,日益成为电商平台难以治愈的顽疾,不断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秩序,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在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的同时,社会各界也逐渐认识到,企业自身的主体责任不可忽视,以商业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

毫无疑问,打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社会共治模式下,在诚实信用这一帝王铁律面前,电商领域假货必将得到彻底治理。本报今天刊发的这篇报道,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 本报记者 张维

一双灰橙配色的耐克 Air Max90 鞋面被整体剪开,露出细密针脚的鞋垫,这是阿里巴巴的打假战利品。

除此之外,在这一平台“假货展示”货架上,同时还能看到 Gucci 皮包、茅台酒、Dior 墨镜、Burberry 香水等价格不菲的奢侈消费品,也能看到 3M 口罩、防晒霜乃至鸡精等日常生活用品。

毋庸置疑,打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但是,来自于执法部门、权利人、电商平台等多方力量的努力,以及它们共同形成的合力,正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步步走向属于打假者的胜利。

不管线上线下,即便是在电商平台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交易也应永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是这场战争中越来越清晰的铁律。

“无论是传统实体商业模式,还是新兴的电商交易模式,信任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诚信经营都是商家立身之本。”今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从近年来消费者的投诉情况看,有关大型电商平台销售假货的投诉确实减少了。

造假信息频曝光

晓丽(化名),一名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年收入十几万的她,抵挡不住品牌的诱惑。如何解决囊中羞涩与爱美之心的冲突呢?她想到了海淘。

起初,刚刚接触到各种海外代购的她很兴奋,不用踏出国门就能买到免税商品,比专柜便宜很多的化妆品,还有名牌包包等,似乎“花的钱越多,省的钱越多”。

不过,渐渐地,这位“海淘党”有点迷惘了。同样一件商品,电商平台上的价格从一两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实在是分不清真假”。更让她不安的是,时不时曝出的制假代购等新闻。那些代购小票、物流信息、购买视频、商家

信用,好评都能造假。

尤其是新近曝出的一则新闻,让晓丽更加了对网购的不信任。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一起江苏苏州警方破获的特大制假化妆品案,所查获的假冒化妆品涉及迪奥、魅可、香奈儿等国际高端品牌共计 15 万件,涉案金额高达 500 万元。

从警方所查获的假冒化妆品仓库看出,制假团队的仿制水平极高。以一款名为 Mac 牌的口红为例,从外观上看,无论是在尺寸、Log 上,与正品相比没有任何差异;打开口红盖,从口红本身的色号颜色上看,仅用肉眼难以分辨出真假。

制假团队更是通过包括化妆品厂家内部员工等特殊途径,提前获知市场上所销售的化妆品喷码号段,在假水瓶下方喷上正品防伪喷码,使得消费者即使查验也难以知晓自己买到的居然是假货。

“原来连防伪码都能造假。”晓丽很惊讶。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怀疑过,除了价格相差太大外,她也发现过代购来的化妆品与从专柜上购买的有所差异,名牌包包皮味味道特别大等等诸多问题。但商家多以批次不同,境内外货物不同等为由予以答复。

“虽然商家总说支持专柜验货,但事实上很难操作,如何让专柜配合验货,而且专柜的导购自己也不知如何鉴定。”晓丽很苦恼。

陈音江证实了这一说法:“从近年来消费者(关于电商)的投诉情况看,投诉内容主要涉及及名贵手表、进口化妆品及部分电子产品,虽然消费者怀疑买到了假货,但由于鉴定等举证程序过于繁琐,一般很难维权成功。”

诚信经营尤重要

假货一直都存在,并不因电商而生。只是,电商的发展让假货出现了新的活跃领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说,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加之微商等新型网络购物模式的出现,都使假货有了更大的销售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扩散了假货的传播力。



图为 2017 年 6 月 6 日,警方端掉湖南永州假 LV 生产窝点,查获大量假皮料。(资料图片)

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网购人数超过 4 亿人,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20 万亿元,移动支付超过 7 亿美元。以海淘人数为例,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中国内地海淘族人数将于 2018 年增长到 3560 万人,代购交易规模也将达到 1 万亿元。

相比于传统的线下交易,网络购物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及其蕴含的巨大商机,也被假货的生产销售者所看到。假货也由此成为电商平台的一颗顽疾。

今年 2 月 7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紧急通告,聚美优品、网易考拉海购、蜜芽网、拼多多、贝贝网、国美在线、淘宝的相关店铺均被发现涉嫌销售假货,部分售假还出自电商自营店铺。作为仿冒重灾区的海淘商品,在获得鉴定结论的 53 个样品中,有 16 个涉嫌仿冒,比例高达 30%。

线上线下都存在的诚信问题,在陈音江看来,线上的诚信经营更为重要:“电商不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耳闻、手触,对购买商品进行直接的感官辨别,而是通过远程、虚拟的网络进行交易,消费者了解商品的信息仅限于网上图片及文字说明,而且交易又是通过网络支付和快递物流。整个交易过程,消费者根本不用和商家见面,完全取决于对商家的信任。因此,相对传统实体店消费来说,电商的诚信经营尤为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制假售假信息被曝光的同时,“有关大型电商平台销售假货的投诉确实减少了。”陈音江说。

这一点在电商平台上也有所印证。据了解,在阿里巴巴平台上,2017 年消费者因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的退款比例为 0.0149%,较上一年下降 29%。换句话说,每 1 万笔订单中仅

有 1.49 笔为疑似假货。

各方力量显身手

投诉减少的背后,是各方力量的重视与努力。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两会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这一提法得到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的公开点赞,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减少的方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治假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2017 年 12 月,公安部专门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针对行业性、区域性、领域性制假售假现象依然突出的问题,深挖犯罪源头窝点,摧毁犯罪产业链条,严惩制假售假不法分子,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江苏苏州、连云港等多地公安机关还通过打假直播的形式,让全社会消费者认识到假货的危害,震慑制假售假不法分子。

今年 8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网络打假直播的形式,让全社会消费者认识到假货的危害,震慑制假售假不法分子。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从调查网络交易平台(网站)入手,进一步发现上、下游涉嫌违法生产经营者,并将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相关属地监管部门。

电商平台在打假上也颇有成效。例如,阿

里巴巴平台治理部于 2016 年初成立了“打假特战队”,用于开展源头打假。2016 年,“打假特战队”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1184 条,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880 名,捣毁涉假窝点 1419 个,破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 30 亿元。

2017 年,阿里巴巴通过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等方式,共排查出 5436 条销售嫌疑超起刑点(5 万元)的疑似制假线索。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联合进行线下打假的执法机关由 2016 年的 14 个省增至 2017 年的 23 个省。

各方力量也在形成合力的尝试中取得成效。截至目前已有全球 105 家品牌权利人加入阿里打假联盟(AACA),与平台、执法机关一同向假货宣战。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 AACA 秋季会议上,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张景利介绍说,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阿里共为公安机关提供案件线索将近 2000 条,抓获 2000 多人,破案捣毁窝点 2000 多处。

以信用档案为据

假货在减少,诚信在重塑,但在一切向好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打假依旧任重而道远。

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柴海涛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侵权假冒手法不断翻新,呈现出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的趋势。治理侵权假货,需要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国境合作,并调动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

记者了解到,电商领域打假面临着系

列难题:比如,由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仍未根除,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和网络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

犯罪成本低,相对执法成本的高昂,制假违法犯罪的成本明显更低。阿里巴巴分析 63 份判决书发现,共判决的 129 人中,判缓刑执行的 104 人,缓刑比例为 81%。

证据认定难导致打击效果差。电商平台普遍反映,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非常困难,线上销售的违法收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较难认定,以至于制假售假分子往往得以逃脱应有制裁。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陈音江认为,诚信经营不能单靠政府监督,关键在于企业自律。电商经营者永远是诚信经营的第一责任人,所有保证诚信经营的制度都要靠企业自觉来执行,需要企业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自觉。电商企业要严格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好评率和消费者权益的关系。

“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对电商平台加强监督管理,尽快建立电商交易及有关服务的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开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根据信用档案记录情况分类监管。”陈音江说,电商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联合监管,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切实减少或杜绝电商领域的不诚信经营行为发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 10 月 17 日讯

短评

构建电商领域诚信体系需各方携手

□ 张维

没有信任就没有电商,这是一直以评价为交易重要参考系数的电商平台,在运营中都会有体会。

在电商平台诞生之前就存在的假货,在交易量巨大且“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商领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这种从线下向线上的快速转移,让假货问题在电商领域显得尤为突出,且几乎被贴上电商“原罪”的标签。

但无论如何,电商领域的假货问题更考验电商的诚信经营。企业的自我治理需及时跟上,不断探索创新平台的营商环境治理体系,既要提升对诚实守信卖家的保障与服务,让他们的经营更简单、更有确定性,又要让故意违规的“失信

者”提高成本,让它们在平台上难有出头之日。

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应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中,推出一系列有关保障支持政策,比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要对诚信行为者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绿色通道”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已出台电子商务法,它成为悬在电商平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上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构建电商领域的诚信体系,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努力;政府尽职监管,企业守法合规,平台加强治理,消费者知假不买。

“老赖”在执行联动格局内寸步难行

□ 上接第一版

陈建春的感受是河南社会各界联手共同破解执行难带来的变化。

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去年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把破解执行难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省辖市、县(市、区)召开专题会议,下发专门文件,全部成立由政法委书记任组长的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各地党委主要领导或到法院进行决战动员,或深入一线现场指挥集中执行活动。

“积极争取人大的监督支持,凝聚形成解决执行难强大合力。”河南高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宋海萍说,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把法院执行工作列为重点监督与支持的内容。

今年以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两个视察组,分别到郑州、新乡、焦作、驻马店四地中级、基层法院深入视察调研,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也分别组织到所辖法院的视察调研活动。全省法院共邀请全国人大代表 220 人次、省人大代表 374 人次,参加执行工作会议、旁听案件审理、见证案件执行、视察调研执行工作。

宋海萍说,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政协支持、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合力攻克执行难的机制更趋健全。

37 项联合惩戒措施全到位

“如果不是社区干部跟我说,还不知道孩子欠钱不还,说啥也不能落个‘老赖’的名声。他不还,我替他还。”郑州市二七航海北街社区李大妈说。

李大妈的儿子是一起借贷案件的被执行人,为躲避法院强制执行,换了手机号,也不在户籍地居住。法院一直找不到人。航海北街社区接到法院执行局的案件情况通报后,工作人员联系片警,找到了李大妈。

二七区委决定实行乡镇分包执行案件制度,按照属地原则将涉民生案件分包到 18 个乡镇办,发挥其人熟、地熟、人熟优势,帮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协助送达文书,提供财产线索,协调化解案件,全民动员掀起执行攻坚人民战争,编织“老赖”无处可躲的网络。

“执行联动大格局犹如一张大网,‘老赖’在网内寸步难行!”二七区人民法院院长王灵说,二七区法院还借力公安部门加大优势,联合设立打击拒执犯罪警务办公室,加大对拒执犯罪打击力度,今年以来,共移送公安机关 12 起涉嫌拒执犯罪案件 12

件,已作出拘役、有期徒刑等实刑判决 3 案 3 人。

二七区法院执行联动模式被河南高院给予肯定,在全省推广。

截至目前,中央、省委确定的 37 项执行联合惩戒措施已全部落实到位。省委组织部加强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的诚信考察,具有失信行为的一票否决;纪委监委约谈失信的公职人员和党政机关负责人;省委宣传部对失信被执行人参评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家庭进行限制;省发改委将失信信息推送到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进行限制。

全省法院、检察、公安机关联手打击拒执犯罪,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进一步支持和监督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若干意见》,62 个县级以上法院设立警务室。今年以来,全省以拒执罪判处刑罚 1409 人,判处有期徒刑 295 人,判刑人数全国最多。

执行公开推进规范化建设

“过去,查执行进展信息,除了打电话,就是一趟趟往法院跑。现在,打开手机,电脑就能查询,实在方便了!”让律师陈天鹏有着这样的感受,是河南高院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执行公开,综合运用 12368 语音平台、短信平台、法院网站、自动查询 App 等,及时向当事人告知执行进展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开执行流程、执行裁定等信息,推动执行工作更加规范、高效、精细、透明,执行管理更加规范。

河南高院执行局副局长马军杰向记者介绍说,河南法院实行执行过程全程留痕,执行案件全部录入流程管理系统,立案登记、流程节点、合议笔录、文书制作、案件报结等,全部在网上流转,网上审批,防止案件体外循环,脱离监管,执行人员外出公务全部配备执法记录仪,对执行现场全程录音录像,执行过程、司法文书一键可查,全程可视,倒逼执行人员严格规范执行行为。

在网络司法拍卖上,除不适合网上拍卖的,处置涉诉财产一律网上进行,所有拍卖环节网上公开,竞拍价格通过网上竞拍确定。截至目前,河南法院累计网拍 12.3 万次,拍卖标的物 8.6 万件,成交 4.8 万件,标的物成交率 78.9%,成交额 272.7 亿元,溢价率 25.4%。在执行案款监管上,全部启用“一案一款一号”系统,执行案款一律转入专属账号,执行到位金额一清二楚。

河南高院已研究出台终本案件办理、执行款物管理、网络司法拍卖、指定执行、仲裁案件执行等几十个规范性文件,既把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又解决了影响执行公正、制约执行效率的深层次问题。

□ 上接第一版

家庭教育促进会等社会资源,建立合格成年人、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法治副校长、司法社工、家庭教育专家等社会观护专业队伍,以此形成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起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预防新格局。

破解未检难题建设特殊学校

“推动建立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长效机制,是我们的重要考量。”英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阮阳说,当前,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轻罪重教育的刑事司法政策下,社会观护帮教概念渐入人心。

英德籍的单亲少年小肖,在他 14 岁那年,因为向妈妈要钱买衣服未果而与妈妈发生肢体冲突,并刺伤前来教育他的舅父,小肖为此被判刑。

按照以往的办案规程,司法机关可能更注重的是,小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名。而在当下,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办案则先查明小肖的成长背景、犯罪原因等,必要时还会进行心理测评,再根据其走向犯罪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教,更注重如何通过精准帮教使其改过自新。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地区开展未成年人观护帮教的人员主要由社区、学校、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组成,大多不具备帮教所需的专业知识,且缺乏专门的帮教组织管理与协调。再加上没有固定场所,对于决定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难以解决考察期间的帮教和脱逃问题。

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阮阳说,2016 年 8 月,经多方走访和考察,在英德市委政法委的主导下,英德市检察院牵头联合粤海实验学校以及法院、公安、司法局、教育、团委、妇联、人社局等职能部门,成立了英德市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帮教基地和英德市粤海实验学校辅教中心。

据统计,至今年九月,帮教基地已接纳帮教学员 404 人。

环保督察点名批评一些地方党委政府

□ 上接第一版

这 4 起典型案例是江苏省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问题,江苏省连云港市化工园区整改不到位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占用草原生态治理及验收工作不落实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工业废气治理问题。

其中,文旅集团在长江豚类保护区内大规模开展旅游活动,并建设了占地达 6000 亩的大江风云影视实景园,但却挂牌“大江豚保护科研基地”,中央环保督察组说,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中央环保督察指出,文旅集团以及相关国土资源部门为谋求经济利益,不惜大面积侵占、破坏保护区,问题突出,性质恶劣。

就这 4 起典型案例的责任问题,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镇江市委、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忽视自然保护区整改工作,仍放任市属文旅集团继续进行开发活动。对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化工园区整改不到位问题,中央环保督察指出,连云港市委、市政府对灌南、漕湾两县化工园区污染问题

重视不足,跟踪督办不力,漕湾、灌南两县委县政府整改工作敷衍应付,对环境违法行为查处不力,整改不力。

中央环保督察透露,“回头看”督察期间发现,锡林郭勒、赤峰、呼伦贝尔等地都有大片草原被企业违规侵占问题,但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赤峰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等国土资源部门对矿山开采造成的草原破坏恢复工作落实不力,敷衍整改,在没有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的情况下通过验收,工作不落实,失职失责。

在今天的反馈会上,第二和第四环保督察组还公开了两地存在的敷衍整改、表面整改以及假整改问题,其背后也有地方党委政府不作为等问题。

吴新雄说,呼伦贝尔市委、政府在组织实施呼伦湖综合治理规划时随意调整,调整变更率达 90%;巴彦淖尔市党委、政府对乌梁素海治理保护力度不够;乌兰察布市党委、政府对岱海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干了的干着、不好干的拖

着,仅 1 项治理任务按照计划完成。

他指出,内蒙古自治区经信委作为工业园区渣场建设的责任部门,只调度、不督办,表面整改、假整改;乌兰察布市经信部门及有关县区政府长期不作为,不监管;赤峰市对部分企业冶炼渣等危险废物管理不到位。

马中平指出,“回头看”督察发现,2017 年武进港等 9 条太湖主要入湖河流未达到治理目标要求,但江苏省仅公开通报考核结果,未对相关“河长”及地方政府进行通报批评。属于典型的敷衍整改。

徐州市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应该 2016 年就开始治理,但到 2018 年 5 月才开始部署相关工作,2017 年全市大气 PM2.5 浓度同比上升 10%。对此,马中平说,徐州市存在表面整改问题。

就江苏省 118 个非法码头的假整改问题,马中平认为,省交通运输厅、南通市港口管理局等有履职不力,把关不严的责任。

截至目前,两省区共对 1197 名责任人实施问责。

本报北京 10 月 17 日讯